

誰之社區？

為甚麼「分享艱難」？

● 陶東風

90年代中期，中國湧現了一批反映當今中國社會問題的小說，被稱為「新現實主義小說」、「現實主義的回歸」，受到廣泛的好評。也有評論把它們稱作「社區文學」或「分享艱難的文學」，因為此類小說的關注焦點是社群（如國營工廠或鄉鎮）而不是個體的生存與發展。其主要代表作家有：談歌、劉醒龍、何申、關仁山等，他們的一些作品，如談歌的〈大廠〉、〈大廠續篇〉、〈年底〉，何申的〈年前年後〉，劉醒龍的〈分享艱難〉，關仁山的〈大雪無鄉〉等等，都成為了評論界的關注熱點。

那麼，90年代中期的艱難是甚麼樣的艱難？90年代的分享又是甚麼樣的分享呢？由誰來分享？為甚麼要分享？在分享艱難者的行列中，主要有兩類不同的角色，他們分別出於不同的動機與原因，分享着不同的艱難。

第一類是基層領導幹部，如〈分享艱難〉中的西河鎮黨支書孔太平，〈大廠〉、〈大廠續篇〉以及〈年底〉中

的國營企業的廠長書記們。他們最深刻地感受着改革的艱難，而分享艱難之於他們主要表現為：在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呈現高度緊張與衝突的情況下，以責任倫理為重，而抑制自己的信念倫理。他必須審慎地考慮自己行為的後果（對於社區的影響），把責任而不是信念放在首位。他們所領導的「社區」，或者是經濟處於貧困線以下的窮鄉鎮，或者是瀕臨倒閉的國有企業。為了維持「社區」的生存問題，這些幹部們就不得不屈從那些所謂社區經濟的台柱的道德敗壞、違法亂紀的暴發戶，為這些人的不法行為提供方便或「妥善處理」。比如〈分享艱難〉中的孔太平十分厭惡道德敗壞的流氓企業家洪塔山，但由於洪是鎮裏的經濟支柱，所以孔太平不但奈何不得這位財神爺，而且還要違心地為他「擦屁股」。再比如，在談歌的〈大廠〉、〈大廠續篇〉等小說中，決定國營大廠命運的那些訂戶都是一些吃喝嫖賭、無惡不作之徒，但是廠領導為了工廠與

工人的實際利益，又不能不違心地討好他們，奴顏媚骨，陪吃陪喝，甚至還要為他們提供犯罪機會。在〈大廠〉中，廠長呂建國面臨的頭等大事，就是要把那位因嫖妓而被抓的河南大客戶鄭主任設法放出來。他說：「要說我心裏話，我恨不得你們（指公安局，引按）槍斃了這個王八蛋，可我得為廠裏兩千多口子的嘴發愁啊。」

第二類分享艱難的人物是處於社會底層、並且在改革開放與社會轉型中利益受到損害的普通群眾，比如〈分享艱難〉中孔太平的舅舅，〈大廠〉中的退休工人、原勞動模範章榮等。如果說基層幹部們為了「分享艱難」而不得不包庇惡人已屬極不正常；那麼，這類普通群眾對於艱難的分享就顯得更加匪夷所思。這些人無疑都是一些安分守己、勤懇忍讓的好人；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好人為了「分享艱難」，就必須放棄自己起碼的尊嚴與權利。在〈分享艱難〉中，作者為我們安排這樣一個情節：田毛毛的父母為了「分享艱難」而放棄控告強姦田的洪塔山，讓他繼續當經理。為甚麼呢？「為鎮裏多賺些錢，免得大家受苦。」

在〈大廠〉中，退休勞模章榮患有重病，卻堅決不住院，不要廠裏的錢。有意思的是，廠裏沒有錢為章榮這些人治病，卻又揮金如土地為鄭主任這樣的大客戶找妓女玩。為甚麼？當然是為廠裏分享艱難，多麼深明大義的勞苦大眾啊！可是，在為這樣的好人深深感動的同時，我們仍然不禁要問：他們付出的代價是不是太大了？更重要的是，他們為甚麼非要付出這樣的代價？為甚麼要放棄自己的基本權利來分享所謂的「艱難」？

我們可以發現，「分享艱難」的文學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揭示社會轉型期物質與精神、歷史與道德、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之間的背離、衝突與緊張，反映出中國當前的經濟轉型明顯缺乏道德基礎。人們為了「社區」的生存與發展（這是所要分享的最主要、最根本的「艱難」），就必須違心地作許多事情，甚至必須喪盡天良、放棄自己的基本權利。「分享艱難」作為事實的描述或許是真實的，然而我們的小說家與評論家在面對這一事實時所開出的藥方則是誤導的甚至危險的。他們恰恰弱化了現實主義的力量，迴避了社會矛盾的本質，把複雜的社會



問題簡單化、道德化了。雖然有時觸及一些現象，如權錢交易，但是未能進入深層的理性反思。似乎只要把人們心中仍然殘存的道德信念發揚光大，大家一起分享艱難，就可以共渡難關。其實問題決不是這樣簡單，改革所遇到的阻力決不僅僅是人們在金錢的大潮下泯滅了道德信念，因而道德主義的思路絕對解決不了中國的現實問題。艱難絕非只要大家憑着良心分享就可以克服的，更不是安排幾個「以身殉職」的人（如田毛毛及其父親、小李、章榮等等）就可以解決的。因為這種艱難從根本上說是一種結構性的現象，其中有着深刻的社會制度方面的原因。訴諸人的良知可能一時能夠解決問題，比如洪塔山悔過以後賣轎車的錢可以解決兩個月的工資、賀玉梅獻出一萬塊私房錢、袁家傑在道德的感召下把技術賣給了鄉鎮企業可以有限地緩解廠子的財政等等，但是決不能鏟除引發這些問題的土壤。所以問題的實質是，為甚麼在中國賺大錢、發大財的人，不是流氓成性就是背後有人（撐腰）？為甚麼企業的命運掌握在只知道吃喝嫖賭而根本不問產品質量的訂貨人手裏？如果這些人是為自己的公司訂貨（從而訂甚麼貨直接與他的個人利益相關），他們還敢、還願意這樣做嗎？而一旦產品的銷售（從而企業的命運）是以真正的市場規律為基礎時，呂建國等人的辦廠方針還會是這樣嗎？答案很簡單，是權錢交易、假公濟私等中國特色的現象扭曲了經濟規律與市場秩序，使之不能正常地調節企業及人的行為；而權錢交易、假公濟私的背後是不正常的政治體制和既得利益集團的呼風喚雨在起作用。因而，改革體

制而不是訴諸良知才是中國社會轉型的出路，是渡過艱難的關鍵，也是克服精神與物質、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背離與緊張的關鍵。一味地用道德主義的眼光看問題，不但無法找到問題的癥結，而且還會造成誤導，似乎市場經濟本身使得中國的改革走上絕路，導致好人餓死、惡人撐死。市場經濟本身當然也會帶來許多社會問題，但那將不是（至少主要不是）中國目前的問題，也不是「分享艱難」的文學所揭示的問題。

最後，再說說社區。我認為中國尚沒有西方意義上的「社區」（共同體），因此應當清醒地看到，中國的問題與西方是截然不同的。中國的問題是，由於歷史與現實的種種原因，社區無法在共同體內部建立平等自由的關係，無法起到保護個人權益的作用；而社區內部的權力與利益關係極為不合理，使得部分人（如洪塔山、鄭主任之流）使用種種不正當手段假公濟私、中飽私囊、魚肉百姓。所以，根本的解決之道應當是強化社區中的自由民主原則，以之來瓦解社區中殘留的專制主義，而後才有可能使社區的利益與人民自己的利益相一致。為了這樣的社群分享艱難才是值得的，也才真正有利於社區的健康發展。

陶東風 文學博士，首都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